

冬日火塘暖烘烘

■卢兆盛



在柴火还没被电与煤气取代之前，老家一带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用来做饭、烤火的火塘。

火塘通常设在厨房尽头靠墙处，四四方方，四周都用砖块砌，一面紧挨着墙壁，另三面边上摆着凳椅。至于火塘的大小，则由各家视厨房面积宽窄而定。

火塘中间立着一个约一尺高的圆形铁三脚架，是烹饪或烧水时用来放置锅具的。柴火在三脚架下燃烧时，火苗呼呼往上蹿，火光四射，整个火塘都散发着腾腾热浪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老家人生活拮据，冬天了，身上仍穿得很单薄，大人小孩一旦得空，便都拢到火塘边烤火取暖。可以说，严寒的冬日，火塘是家里最温暖的地方，而冬夜则是家人团聚在火塘边最多的时候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火塘边，一边烤火，

一边聊天，打发着冬夜漫长时光。

我们这些小孩儿生性好耍贪玩，但在外面玩够了，还是得乖乖地回到家里的火塘边。冬夜里，我们几兄妹最喜欢缠着奶奶讲故事。

燃烧着柴火的火塘，也是煨烤美食的好地方。这些年流行的围炉煮茶，或许风雅，但小时候的冬日火塘美食，更为乡土。

把红薯埋入厚厚的、闪烁着火星的柴灰里，用不了多久就会煨熟。拿火钳夹出来，拍去灰，剥掉薯皮，便可大快朵颐。诱人的薯香味，远远都会闻到。入冬后，新打的红薯粉特别筋道，嘴馋的我们时不时拿些粉条插入火塘里煨烤。圆圆的粉条在灰里受热后迅速膨胀，变成一根粗壮的白白的棒棒，吃起来，松脆爽口，香气四溢。

后来乡间可以养猪了，每年杀年猪那天，是我们小孩儿最快乐的日子，不仅

能饱餐一顿杀猪饭，还能吃到香喷喷的烤猪肝。年猪宰杀后一开膛，大人们便切下巴掌大的一块猪肝，在猪肝的两面划一些刀痕，再均匀地抹上盐，让我们这些贪吃的小馋猫拿去火塘烘烤。我们用火钳扒出一些红光熠熠的柴炭，再将火钳微微张开，放上猪肝，架在火炭上烘烤。烤好一面后，再翻过来烤另一面。望着烤得滋滋冒热气的猪肝，嗅着阵阵扑鼻而来的猪肝香，我们垂涎欲滴……

火塘里烤糍粑，也是一种极美的享受。采用的也是烤猪肝那个做法，将糍粑放在火钳上，两面逐一烘烤。待烤到微微焦黄时，糍粑已是弹性十足，散发出的醇香格外诱人。咬一口，软糯弹牙，唇齿留香，回味绵长。

老家的火塘，是一个充满温暖和温馨的港湾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火塘渐行渐远了，但它留在我心里美好的记忆，久久不会磨灭。

填充元旦

■张凌云

新的一年近在眼前，再一次想起有位大学好友30多年写过的这个题目。也正是这个题目，每每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会警醒我：又将告别既往，你拿什么来填充元旦呢？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二十岁时，常会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念叨起朱自清的《匆匆》：“你聪明的，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”三十岁时，还会暗自多一分庆幸，认为自己还没到蒋捷所说“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”的年龄。而今到了知天命之年，虽然心里默认了俞平伯的《中年》：“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，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，可是走得近了，空翠渐减……憧憬既已消释了，我们遂坦然长往”，但内心还有些怅然若失，总没有那么云淡风轻的。

2023年似乎过得太快。或许是疫情结束后抱有太多的期待，或许是年复一年时间像行驶在开阔原野的列车，越来越带有让人不易察觉的加速度，有些感觉还没进入高潮，却已经煞

了尾。其实许多年份都是这样，人心总是容易懈怠的，始终保持激情澎湃的状态极难，卓尔不群如陶公，在表露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豪情的同时，亦有着“荏苒岁月颓，此心稍已去”的慨叹。若论成绩，这一年太过平庸，升官发财既非吾愿，自当绝缘，全年省刊以上发表作品不足10篇，相比去年几乎减半。更主要的是，进取精神不足，多年的写作生涯又进入了新的瓶颈期。

前些日看了一篇有关尼泊尔的文章，配以各式图片，颇有感悟。尼泊尔并不是个发达的国家，但凡到此旅行的人，都会钦羡这个国度人们的从容达观。“很羡慕他们脸上简单而幸福的笑容。尽管物质条件并不富裕，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坚定而富足。也许是因为信仰，也许是与信仰无关的那些东西，每个人都仿佛活得如同热带植物一般丰盈繁茂。”是的，许多时候，我们活得太累，活得不快乐的根源，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羁绊和束缚。

包括我们的所谓精神追求。譬如写东西，应顺从内心自然的呼唤，不能为了

某些不切实的想法反为其累。年岁既长，精力肯定不如年轻人，身体健康更为重要，何况既然把自己定位草根，成名成家更不可能，那就不必给自己苛求太多任务，体验想写就写的快意写作足矣。

听过一堂心理学讲座。主讲者不是名家，但有句话颇具哲理：“把家收拾好，把心安顿好。”此话看似平淡无奇，却令人豁然开朗。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归根到底在于我们的心如何去辨认，如何去担当。若能给心灵撑一副支架，寻一泊港湾，那么，我们就能化繁为简，去伪存真，再多的雨雪风霜也能迎刃而解了。

所以，我给新一年的元旦郑重地填写下“简单”二字。因为简单，我才会看明白最需要做的事，最适合做的事；因为简单，才会放弃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；因为简单，才会笑看风云，吟啸江湖，更深入地体味“自然是灵魂的反面”这话的精彩。冰心曾说，人生从八十开始，我不敢比肩先生，那么，我就从五十开始，用简单去筛选新的选择和希望，去丈量苦痛和快乐的距离。

放飞纸飞机

■杨德振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山里上小学，学校很破旧，但学生很多。我们一般都是提前半小时到学校，学校唯一的篮球场和乒乓球室总是被四年级的学生“霸占”，根本轮不到我们低年级学生从事课外体育活动，于是，我们一二年级的学生便自找娱乐项目，跳绳、斗鸡、走田字棋、叠纸飞机、玩泥巴……尤其是叠纸飞机，我记忆深刻。

那时候，每个学期开学，学校给我们发一本新语文书、一本新算术书和两个作业本。我和小同学们便悄悄撕下作业本中的一页，叠成纸飞机，在学校操场上放飞，比赛看谁的飞机飞得高、飞得远。有时候，纸飞机飞得高了些，飞到了附近村民屋顶上，我们不甘心飞机“停泊”在瓦屋上，便到处找长竹竿，想方设法拨弄下来。有时候，纸飞机还飞进了附近的池塘里，我们也要想办法“打捞”上来，放在太阳底下

晾干，重新再叠。一张纸显得弥足珍贵。

到后来，作业本不够做作业之用，老师发现作业簿越来越薄了，便知道我们“另作它用”了，便把我们狠狠批评了一通，还顺便向家长“告状”。父亲不由分说，往往用细米条直接抽在我屁股上，打了几下算作“警示”。

为了叠好纸飞机，每逢有飞机经过村庄上空时，我们便跑到山冈上去观望。那时村庄附近的高山上还有民航导航台，村庄上空是飞机的必经之地。看清在空中翱翔的飞机的轮廓，我们对自己制作的飞机更加有信心了。

后来，我们还另辟蹊径，就地取材，找到大队部里的各种废旧报纸作为原材料，制作“大飞机”。报纸柔软很多，折叠出来的“大飞机”普遍飞不高、飞不远，让我们很沮丧、很失望。

刚开始，大队干部还以为我们从小喜欢读报纸、“紧跟时代步伐”，后来发现

我们是“调皮捣蛋”、瞎折腾，便叫邮递员把报纸送到一间上了锁的屋子里，从橱窗里丢进去，我们的“偷纸计划”便落空了。

说来也巧，当时的报纸上有一个文艺版，上面有许多优美的散文。从三年级开始要写作文后，我竟不忍撕报纸折飞机，反而保存了下来，带回家贴在黑漆漆的土坯墙上，一有空便认真阅读。最后，一面墙上贴满了报纸，反而成了一道明亮的风景，并引领我把兴趣转移到阅读上了。

读到四五年级时，我们对叠飞机已没了兴趣，更多的兴趣放在了看课外读物和探求知识上。这也许是每个人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和环节吧，从顽皮、淘气、懵懂到懂事、知事、知理、成熟，每个人都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。如此说来，我们儿童时放飞的不只是纸飞机，还有五彩缤纷的梦想。

彭老师

■郑海青

前不久，中学同学群里一位同学发了条信息：彭健民老师去世了……同学们顿时一片凄然。那一刻，彭老师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在我眼前……

彭老师是衡东一中的化学老师，曾经教过我一年初中化学。虽然教我的时间不长，但他是那种注定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人。

彭老师生于上世纪40年代，他个子不高，但身板很结实，经常见他背着手在校园里碎步而行。彭老师是典型的国字脸，花白的头发一根根向上竖起，颇有岳飞怒发冲冠的气势。他不修边幅，经常胡子拉碴也不以为意。虽然长得棱角分明，不怒自威，但彭老师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可以说是迷之微笑，如果遇到熟人，那就笑得更开心了。当他开怀大笑时，就能看到一口被香烟熏得“锈迹斑斑”参差不齐的大黄牙。

彭老师说话很快，音调很高，像机关枪，一口“厂矿普通话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为了完成“两弹一星”、能源开发、机械制造等“国之重器”工程，成千上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汇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工作。大家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交流，后来慢慢变异趋同，就形成了各种厂矿普通话。也许彭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吧。听说彭老师的父亲的确是参加过重大科研攻关的老一辈科学家，如今彭老师的儿子也成了科学家，彭老师承前启后，功不可没！

彭老师的儿子是我校友，虽然只比我大一岁，但却高我几级。他属于超级学霸，小学阶段就频频跳级，到了中学更是一枝独秀，考到了中国科技大学，如今已经成为量子学领域的领军人物。

彭老师动手能力极强。他曾经买来自行车的零配件，靠着螺丝刀、扳手等几件简单的工具，自己组装了一辆自行车。至于维修什么家用电器，就更不在话下。研究表明，喜欢拆装东西的人往往蕴含了很大的创造力。假如彭老师生而逢时，很可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彭老师几乎天天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中山装，领口和袖子已经磨得发白。炎热夏季，他则穿着一件白背心。如果仔细观察，还会发现彭老师的衣服上有一些小洞，据彭老师说，那是在做化学实验时被溅出的腐蚀性液体腐蚀的。

彭老师的课非常精彩。他声如洪钟，振聋发聩，最后一排的同学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想打瞌睡根本没辙；他注重实践，带着我们做一个个有趣的化学实验，感受科学的乐趣；他循循善诱，通过设问引导我们主动思考。彭老师上课最常用的口头禅是：“有同学就会问了，老师呀，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一般这种情况，想开小差的同学都会支棱起耳朵，听彭老师说出其中奥妙。彭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，而是不断激发我们的科学想象力，他永远充满激情，充满力量，粉笔板书银钩铁划，写错了字，直接大手抹去，返身叉腰继续讲课，弄得全身都是粉笔灰也毫不在意。每当讲到兴起时，他大手频频挥舞，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三军统帅。

彭老师对物质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要求，蓝色中山装、绿色解放鞋就是他的标配，但他的精神世界是富足的，从他永远笑眯眯的嘴角和整天忙碌的身影里就能切身感受得到。

毕业后，我只见过彭老师两三次，每次他都笑着和我打招呼，精神矍铄，风采依旧。看着他硬朗的身子，听着他的爽朗的笑声，加上乐观豁达的心态，我想彭老师一定会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，可没想到……

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我清晰地记得在30年前，彭老师用白磷燃烧的化学实验，告诉我们“质量守恒”这条颠扑不破的定律。物质不灭，精神不朽。我相信，彭老师的品德风范必定会长存于天地之间，铭刻在我们记忆深处，激励更多的人奋勇前行！

彭老师，我们深深怀念您！